

我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

吴 大 琨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因此，很愿意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时谈谈我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其中有不少事情牵涉到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对这些事情的回忆也许会为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一些史料。

我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一、学生时期；二、救国会时期；三、保卫中国同盟时期；四、担任美国驻华空军联络顾问时期。现在就从我的学生时期讲起。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是苏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事变的消息传来后，同学们爱国情殷，群情激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集体到南京去，向当时的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请愿。蒋介石对去请愿的苏州大中学生是比较“客气”的，我们一到南京，就被招待住进了南京的中央军官学校。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礼堂里公开接见我们，并发表了讲话。讲话的大意是：他是愿意做中国当代的岳飞的，但现在中国国内有秦桧，所以就使得他当不成当代的岳飞了。他讲的秦桧，究竟是指当时的什么人，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就糊里糊涂地返回了苏州。但他并没有接受我们的要求出兵抗日。随后又不断有上海的大中学生到南京去请愿，不过蒋介石就不客气了。他让军、警、特务对上海去请愿的学生大打出手，把他们统统强行赶回了上海。我当时在苏州，听到这些消息后，心里非常苦闷。为什么蒋介石不愿抗日？上海的学生去请愿，他怎么竟加以镇压？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苏州的

学校这时全部停课，我获得机会广泛地阅读一些课外书。有一天，我在苏州的一家旧书铺内偶然买到一本《西方革命史》，书中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都讲得很清楚。这对我真是一本启蒙的书，它使我明白了国家的政权原来是有阶级性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它不抗日，反倒镇压人民。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眼界大大地打开了。接着我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等到学校开学，恢复上课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就已经对马列主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从此，我对开学后学校当局提出的“读经救国”^①等谬论再也忍耐不住了。我利用我们这一年级出的壁报，写了一篇《告读经救国论者》的文章，对“读经救国”的谬论痛加驳斥。这就引起了一些当时在思想上已受“读经救国”谬论毒害的同学们的反对，他们也在壁报上写文章攻击我，于是双方在壁报上展开了论战。学校里本来就有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史地学会”的名义，也大出壁报，并专门出了一个专栏声援我的主张，使我深受鼓舞。不仅如此，他们还派人与我联系，介绍我参加了当时苏州的“世界语学会”，学习世界语。入会后我才知道这个学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它的阅览室内陈列着许多革命的书刊，这些书刊是外边看不到的。其中有一种杂志名《中国论坛》，是当时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办的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的机关刊。刊物中载有报道当时“苏区”情况的各种文章和图片，我读后才知道中国当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这刊物上附有信箱的号码作为通讯处，我就通过信箱给该刊的编者写了信，不久收到了编者的回信，欢迎我去上海谈谈。我去之后，见到了该刊的中文编者，同时还见到了该刊的主编，美共的伊罗生同志。当我被中文编者用“同志”的名义介绍给伊罗生同志时，真是万分激动。以后我就成为《中国论坛》在苏州的

① “读经救国”就是主张读“四书五经”救国。

推销员，该刊的编者也继续与我通信。但为时不久，就接到一封
信说要暂时中断与我的联系了，要我再去信。我正感到惶惑时，
有一天见报载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破获了第三国际在上海的
秘密印刷厂的新闻，那个印刷厂的地址就是我去上海和《中国论
坛》中文编者会面的地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就在这个时候，
苏州的世界语学会也遭查封，并有一些人遭逮捕，被铐着押解着
走过我家门前。在此情况下，我有好几天未敢在家中居住。
这时学校里的情况也不好，由进步学生主持的学生会与学校的训
导主任闹了起来，致使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进步同学不得不离校出
走。我因参与这些活动，又反对“读经救国”，学校以“该生目
无一切，妄肆批评”为由，给了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但因
我是毕业班学生，马上就要毕业，所以学籍总算被保留下。高中毕
业后，因是春季班，无大学可考，就去南京一个政府机关做了半
年的统计员，待暑假后考入苏州私立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是教会
大学，着重英语，不仅英语课由美籍教师任教，其他课程也都用英
语讲授。我当时很理解英语的重要性，认为教会大学的课程，从马
列主义的观点看，都是无用的，只有英语才是有用的工具，所以，
我在东吴大学集中力量学习了一年英语。这时我已参加了上海的由
陈翰笙、薛暮桥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是当时在
国民党统治区的唯一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经济形势的学术团
体，它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经常发表许多精辟的、阐明中国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的经济论文，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在东吴
大学读了一年书，因学费很贵，觉得不如用这些钱出国留学，于是
我就到日本去学习。当时去日本，不但费用不多，而且不需要办什么
手续。我到日本后就在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内挂名做研究生，而实际
上则开始自学英文本的《资本论》。但《资本论》很高深，花了很多
精力还是读不懂。有一天，我到东京的一家“丸善”外文书店闲逛，无意中发现
了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用英语出版的，由苏联教授列昂捷夫编写的《政治

经济学》一书。我如获至宝，马上买回来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读完这本书，再读《资本论》就不再感到什么重大的困难了。我想，这本书既然能帮助我读懂《资本论》，为什么不把它译成中文，让更多的读者也受到它的益处呢？我就开始翻译《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后来在1936年11月间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大众政治经济学》。

我是在1935年8月去日本东京的。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友孙冶方同志、毕相辉同志也都在东京。认识他们以后，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许多帮助。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共有三千多人，党在留学生中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任白戈同志。我与他联系后，他就把我编入了一个读书小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我与国内也仍经常通信，保持联系，在与我保持这种联系的许多师友中，有一位就是后来成为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他原来是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行长。我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时就跟他认识。有一天，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回上海工作。这时候，我也正因为参加任白戈同志领导的活动而开始受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为了避免麻烦，我便决心回国。刚回到上海，我就访问章乃器先生，这时，我才知道自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各地都已成立了救国会，并在1936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机构，章乃器先生已在该会内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他邀我住在他家里，担任宣传部的总干事，编辑“救国会”的机关刊《救亡情报》。这样，我便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开始成为救国会的一名干部。

二

我在救国会时期的工作，大体说来，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七君子”被捕以前的工作和“七君子”被捕以后的工作。“七君子”被捕前，我就住在章乃器先生的家里。乃器先生原在

江湾买有一幢住宅，这时因为参加救国运动，受到国民党的打击，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他就在上海原“法租界”地区，当时名台拉斯脱路的台拉新村24号内租了一幢房子居住。他和他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先生住二楼，我住二楼的亭子间。住在乃器先生家里，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多久，我就认识了许多当时救国会的领导同志，特别是认识了两位较重要的同志，一位是当时代表党，即代表潘汉年同志与乃器先生联系的曹亮同志；还有一位是当时代表第三国际在上海出版《中国呼声》刊物（《中国论坛》刊物的后身）的美共格兰尼希同志。由于我就住在乃器先生家里，所以，1936年11月22日“七君子”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曾亲眼看到乃器先生被捕的情况。乃器先生被捕离家以后，我走进了乃器先生的卧室，见到子婴先生这时正在很镇静地坐着抽烟，我向她说：“乃器先生被捕了，但还未抄查家里，很可能再来抄家，所以，趁现在这时候要把家里所有的违禁物品很快处理掉。”这一下，提醒了子婴先生，她马上让保姆生起火炉，把家里藏有的大量印刷品都作了处理，把救国会已经印好的，为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女工而进行捐款的收据也都烧掉了。这件事情在这里有特别讲一下的必要，为什么国民党在11月22日晚上突然动手抓人呢？这恰好和当时的日本纱厂女工的罢工风潮有关。当时，上海日本纱厂的女工正在罢工，她们要求救国会支援，救国会认为支援这些女工是义不容辞的，于是就发动了为支援日本纱厂女工罢工而进行的募捐运动。但这情况很快为日本的驻沪领事馆知道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就向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了严重抗议。吴铁城在日本的压力下，只得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后就对“七君子”下了逮捕令。这是“七君子”所以会在11月份被捕的直接原因。我向子婴先生提出烧毁文件的建议过后，又想起了应把“七君子”被捕的事件立即通过《救亡情报》向各方面报道。于是我马上起草了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向政府提出抗议的宣言，又请子婴先生用家属的身份写了一篇描述乃器先生

被捕情况的报告文章，在第二天黎明时刻赶到印刷厂，印刷厂的老板和工友都非常热情支持出版这一《救亡情报》的“号外”，立即排印。当天傍晚，“号外”就已出版，我要求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除马上分送各救国团体外，再加送几份给上海的外文报馆——当时上海有英国的《士林西报》和美国的《大美晚报》。这两家外文报馆收到“号外”后，就在第二天的报上作为头条新闻刊出。当时，上海的所谓“高等华人”界，无不看西文报纸的，所以，消息刊出后，立刻震动了上海上层社会的各方面，过了一天，中文报纸也就不能不把这一消息全部公开了。

这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失去了可以居住的地方，我已不能再在乃器先生家里住下去。但是，住到哪里去呢？我首先想到了格兰尼希同志，我去找了他。他和他夫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住在他家，并且供我吃饭。可是，他们住的是公寓房子，并无多余的空间，我只能睡在他们客厅里的长沙发上。这当然不是办法。我又想起了当时住在哈同路觉园佛教协会内的赵朴初居士，他与我是东吴大学同学，平时就非常同情救国运动，对我很支持，我去找他，他果然十分热情地留我住在觉园内，每天还招待我吃早餐。这样，我就又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

“七君子”被捕后，被押解到苏州，关在当时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内。差不多每天都有群众去慰问他们。我当时的老家还在苏州，有一天，我请我母亲烧了几样菜，作为乃器先生的亲属，送到看守所去探望他们。他们这一院子，共有四间平房，乃器先生和王造时先生合住一室，韬奋同志和李公朴同志合住一室，另外是沈衡老和沙千里同志合住一室（史良同志因被关在女牢内，我没有能去探望她）。还有一间是吃饭和保管慰问品的房间。我见到他们后，就分别汇报了他们被捕后救国运动仍然在开展，《救亡情报》出版等情况，他们都很高兴。

我回上海不久，有一天，接到格兰尼希同志的通知，说宋庆龄同志找我，我就如约去当时的莫里哀路（即今天的香山路）29号

名的孙公馆访问了宋庆龄。宋庆龄除对我的坚持工作表示赞赏外，还问我工作上有何困难，我提出自“七君子”被捕后，已经失去了可以公开收信的地方，以致很难与《救亡情报》在各地的通讯员和读者保持联系。宋庆龄听后立即表示可以用她的住所作为《救亡情报》的公开通讯地址。后来我遵嘱把这一地址印在报纸上，很快就与各地的通讯员和读者恢复了联系。宋庆龄接见我的日期是1937年5月25日。我在访问她时，曾把我在1936年11月间出版的《大众政治经济学》一书赠送给她。她收下我的书后，因知我是留日学生，就随手把一本她刚收到的日文书送给了我。我的那本书一直到如今还被保存在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图书室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七君子”出狱，《救亡情报》因已完成历史使命而自动停刊。我在救国会时期的救国工作也就告一段落。

三

抗战发生后，我曾一度离开上海，参加刘良模同志领导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的工作辗转苏州、南京、芜湖，最后到达武汉。在南京，我们去八路军办事处拜望了叶剑英同志、廖承志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在武汉，我们去八路军办事处拜望了博古同志。在武汉，一辆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撞翻了我乘坐的人力车，我从车上被撞翻在地，摔断了右臂骨，只好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我母亲在上海（这时上海已被称为“孤岛”）得知我的情况后要我回上海养伤。我便从武汉经广州、香港回上海。路过香港，我去拜望了两位同志。一位是潘汉年，他告诉我，他已不再负责上海的工作，负责上海工作的已是刘少文同志，他答应可以通知刘少文与我联系。另一位就是宋庆龄。宋庆龄同志见到我后表示救国会的工作告一段落，现在她已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专在经济上及医药物资上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当即很恭敬地站起来表示愿意参加。她听后很高兴，招待

我吃过午饭后，写了一封英文信交给我，让我回上海交给当时在上海女青年协会工作的美国人耿丽淑女士，信中让她负责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会，并说分会成立后可与在香港的总会分工。总会在香港主管支援八路军，分会在上海主管支援新四军。我回上海以后，就和耿丽淑女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会。参加者共五人，除书记耿丽淑女士外，还有在男青年协会工作的吴耀宗同志、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同志、在上海的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在《大美晚报》任职的张似旭同志和我自己。分会成立后，我们就积极为新四军募集款项和医药物资，因有地下党领导刘少文同志的大力支持，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除将募到的款项和医药物资交由新四军派到上海来的交通人员带去新四军外，还动员了一批上海进步的医生和护士去新四军服务，并在新四军中创办了军队医院。

1939年初，上海各人民团体，主要是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会，认为应当派人去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进行慰劳并调查，了解新四军究竟还缺少什么物资需要上海人民给予接济的。随后我被推为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去慰问新四军。我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受到了项英同志等的热烈欢迎。我在新四军地区进行参观访问时受到了很深刻的革命教育。没有想到的是，我离开新四军军部返回上海途中，突遭第三战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机关的非法绑架，他们把我押解到江西上饶，将我秘密囚禁在茅家岭的黑狱。

我是在1939年5月12日在安徽太平县被捕的，在上饶被秘密囚禁了一年多时间，至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上饶集中营”时，又将我移囚于集中营。在集中营中，我和冯雪峰同志、郭静唐同志、王闻识同志等七人同囚一室，因而曾被集中营中的革命同志尊称为“七君子”。在“集中营”又被囚了一年多，直到1942年11月经多方营救，才被保释出狱。我被囚禁期间，有一天在报纸上忽然见到上海的张似旭同志被敌人暗杀的新闻，我感到悲痛极了。为了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为了抗日救国，

我献出了我的自由，张似旭同志则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四

我被保释后，在福建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讲授英语，后又在商学院兼课，讲授“战时经济”。一年以后，到广东曲江仙人庙私立东吴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不久，日军兵临曲江，东吴大学迁到广西桂林，因经费困难，最后只得宣告解散。

我到桂林以后，就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当时桂林党的文教书记是邵荃麟同志，1939年我去新四军慰劳途经浙江金华时就认识他。这时他为我安排了工作，因我懂英语，就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把我介绍到美国驻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联络部工作。所谓“联络部”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搞情报，美国驻华空军要轰炸日本在华南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了避免误伤敌占区的中国人民，不得不要求有比较精确的情报以确定轰炸的目标。正好有一位姓李的同志，他是桂林一个中学的教员，想带领他的学生去东江游击队参军。经过荃麟同志的安排，就由我出面把他们介绍给了美国驻华空军的十四航空队。由航空队供给他们旅费和工作证，让他们进入了东江游击队。东江游击队的领导十分重视美军的要求，立即组织专人化装成苦力，混入广州的日本机场附近活动，日本侵略者就把他们抓进飞机场，让他们在飞机场内做工。这些同志就利用这一机会，把日本飞机场的周围情况、地貌标志都弄清楚后绘制了一张地图，再把它送出来交给我。日本侵略者非常狡猾，它们公开停放在飞机场上的飞机实际上都是用木板、纸板做成的，是专门用来吸引美国的飞机前来轰炸，从而浪费美国的炸弹的，它们真正的飞机则都隐藏在飞机场周围山洞中的飞机库内。美军驻华空军司令部取得这一地图后，先派侦察机去照相，证实地图上的标志后，就派出重轰炸机用重磅炸弹把这飞机场周围的山洞都炸毁了。这样才真正炸掉了日本的飞机。

这次轰炸成功后，美国空军认为我立了大功，曾问我我要多少

奖金。我表示，美军帮助我们炸毁了日本飞机，我作为中国人，非常感激，怎么还能要美军的奖金？我坚决谢绝奖金，美军大为赞赏，他们提供旅费让我接家眷后去昆明美国驻华空军的总部担任“顾问”。我到昆明首先找了党的领导。当时，在昆明代表党做工作的是华岗同志。华岗同志让我利用美军飞机到广西的八步镇找李济深将军。我到那里不仅找到了李济深，还找到了当时在八步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陈此生等先生，向他们讲了党中央想成立“联合政府”的意图。后来，我又去福建的永安、南平和江西的铅山，因与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有联系，引起了第三战区特务机构的注意，它们向上报告后，顾祝同就批示要把我“立即逮捕，就地枪决”。幸亏当时正在三战区工作的宦乡同志及时地把这消息通知了我，我就连夜乘美军吉普车逃往福建长汀转乘飞机返回昆明向华岗同志复命。

此后，我又在昆明工作了一段时间，直至抗战胜利前夜，华岗命我到重庆见王若飞同志。我去重庆见到王若飞同志后，他要我在日本宣告投降时尽快利用美军飞机赶赴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传达一个命令，即中央不同意上海的地下党进行武装起义，而是要展开民主运动，并创办报刊，掌握宣传阵地。日军投降后的第四天，我搭乘美军第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赶到上海，找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同志，向他说明了中央的意图。上海地下党遂改变方针，从各方面推进了民主运动，并创办刊物。我也在1945年间创办了《经济周报》，团结、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同时，我仍担任美国驻华空军联络司令部的“顾问”，直到1946年，美国撤销在华的驻军机构后，由美军推荐，我于1946年10月离开上海，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远东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样，也就胜利地结束了我的抗日救国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